

## 聲音·文體·國體

### ——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

黃美娥\*

#### 摘要

「戰後初期」（1945-1949）實乃臺灣文學史上的關鍵時刻，這是肇因於此一階段既上承日治時代殖民統治，又下啓中國政權重新執政，而隨著政治權力結構的劇烈變化與交接移轉，臺灣文學的內容也必須爲之調整、改易，過去的語文存在模式更是遭逢考驗，「臺灣文學」面臨了要轉變成爲「中國文學」的樞紐期。針對上述現象，本文在此特別留心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的關係性，尤其是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語文更迭之際，有關「國語」的學習與書寫，更成爲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兩造進行「嫁接」的重要基點。於是，當如火如荼的國語運動風潮展開之後，隨著國語運動的普及性、強制性，語言改革成爲公共話題，文學領域遂同受薰陶，對於臺人而言，舉凡「國音」的養成、「國文」的書寫、「文法」的熟悉、言文一致的要求，便會從日常語言漫衍到文學語言，強力促使臺灣文學產生與時俱進的質變，至此，由日治時期到戰後階段，因爲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學所曾引起的「聲音·文體·國體」三方面的交互作用，便出現了

---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從「日文」到「中文」，從「漢文」到「國文」，從「文言」到「白話」，經由國家強力動員而定於一尊的「國語」所陸續引爆出的文字讀音、文體書寫、文學秩序、文學本體的丕變，促使戰後臺灣文學進入一種迥異於日治時期的新狀態。對此，本文在展開實際論述時，文中首先剖析戰後初期的臺灣國語運動相關運作與各式反應情形，以及魏建功、齊鐵恨有關國語學習方法論的特點；其次則就臺灣文學遇上國語運動之後的紛紜現象加以釐析，並指出日治以來島內出身不同語文系統作家與省外來臺作家之間的非均質反應，最終進以闡述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因為國語運動所造成的文學場域複雜變遷樣態。

關鍵詞：戰後初期、臺灣文學、中國文學、國語運動、文學場域

# **Voice, Literary Style, Nationality:**

##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Taiwan Literature (1945-1949)**

Huang Mei-e

### **Abstract**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s the key mo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It was a period that the Chinese replac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th the changing of political structure, Taiwan literature writers had to revise their writing. In that case, “Taiwan literature” actually faced a key period that becoming into “China literature.”

In response to these phenomena, this article notic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Taiwan literature. The alteration of “Uprooting Japan and implanting China” phenomenon, was the point of Taiwan literature became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egan, the language reformation became public issue with its popularity and mandatory. For Taiwanese, it contented the “speaking national accent,” “writing Chinese,” “studying grammars,” which passed the limit of daily language, went into the area of literary language.

From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Japanese” became “Chinese,” “Han-wen” became “Guo-wen”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re was interworked in “voice, literary style and nationality.”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the changing of pronouncing and writing had led the changes of literature order and literature itself, and had made Taiwan literature went into a new stage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d the operation and reac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the feature of the mandarin-learning methodology of Wei Jian Gong and Qi Tiehen. Then analyzed what was happened when Taiwan literature met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pointed out the different reaction of local and provincial writers. Final,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complicated state of literary field caused by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Keywords: early post-war period, Taiwan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iterary field

## 聲音·文體·國體

——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

黃美娥

我到了人生的暮年，仍未親身以國文寫小說，察覺很遺憾的事，假如健康許可的話，我想寫短篇小說。但願有生之年，以國文來創作，這才有面子去看祖先們了。

龍瑛宗〈身邊雜記片片〉<sup>1</sup>

### 一、前言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臺灣回歸中國懷抱，就此進入戰後階段。在戰後時期，臺灣緊鑼密鼓展開「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工作，<sup>2</sup>其中「國語運動」的推行，便是重要一環，而且影響

---

\* 本文之撰寫，承蒙郭双富先生慷慨借閱戰後初期多種國語文書籍，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生王俐茹、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溫席昕協助文獻資料之收集，施懿琳、松浦恆雄教授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sup>1</sup> 文章原載《民眾日報》，1979年3月23日，收於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第6冊，頁329。

<sup>2</sup> 有關戰後臺灣文化重建工作的展開與實踐情形，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

深遠，非唯在1946年設立專職機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予以推動，此後儘管組織歷經幾番分合更替，相關負責業務內容有所變化，<sup>3</sup>但直到現今，國語文的學習，仍是國中、小學教育大業。事實上，追溯這段起自戰後初期<sup>4</sup>的國語學習風潮，雖然臺灣當時或被視為是來臺許多中國國語學者眼中的「新耕地」或「實驗臺」，<sup>5</sup>但實驗與耕耘的結果顯然令人驚艷，1932年曾因「詞的解放運動」與魯迅（1881-1936）筆戰而聲名大噪的曾今可（1902-1971），他在來臺數年後的1948年，於一次公開演講中便已倡言，國語在臺灣推行迅速、普遍，他相信十年之後，全臺灣的語文一致是毫無問題的，而且「恐怕將來首先辦到語文一致的一定是臺灣。則中國的模範省，自然也一定是臺灣了」。<sup>6</sup>

而這種佳績，果然在進行數十年後更為可觀，1970年時任副總統的嚴家淦，同樣也在公開演講中，回顧臺灣光復二十五年來的各

---

2007年）有清楚介紹。

<sup>3</sup> 以現階段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工作要務而言，參照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簡介可知，實際涵蓋了閩南語、客語與南島語的相關業務，以及海外華文教學、兩岸語文研究等，因此相較戰後初期更顯複雜許多，參見網址：<http://dict.concised.moe.edu.tw/main/copyright/kuh01.html>，檢索日期：2012年12月20日。

<sup>4</sup> 本文在行文之際，有關1945年至1949年間的階段，現今臺灣學界常用「戰後初期」予以陳述，但在當年時空語境中，大多使用「光復初期」，故本文在進行論述或回溯往事時，可能導致出現二者雜用現象，特此說明。

<sup>5</sup> 參見吳守禮：〈臺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新生報》第209號，「國語」第1期，1946年5月21日。

<sup>6</sup> 參見曾今可：〈文藝作品的社會價值——八月二十五日在臺灣文藝社學術講習會講〉，《建國月刊》第2卷第6期（1948年9月），頁12-13。另，有關曾今可與戰後臺灣文學的關係，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從「詩的解放」到「詩的橋樑」——曾今可與戰後台灣文學的關係〉有所勾勒，前者收入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頁291-296；後者為「海峽兩岸百年中華文學發展演變研討會」會議論文（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臺灣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臺灣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共同主辦，2011年4月16-17日），頁1-21。

項建設，他以為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均有長足進步，但最見成效的則屬國語文教育，甚至強調：「我們在臺灣二十五年以來對於國語文的成就，可以說全國之冠，全國之第一，以前雖然用過各種的努力，我想其他有許多地方沒有像此地來得好。」<sup>7</sup>那麼，面對這場日後被評價為相較中國其他地區更為成功的國語運動，其相關過程究竟如何展開？臺人有何反應？尤其是戰後初期歷經日治後期高度「皇民化」洗禮者，又會怎樣因應？前引著名作家龍瑛宗（1911-1999）於戰後生活已達三十餘年後的1979年，已屆暮年的他，卻仍感到未能以「國文」<sup>8</sup>寫作而遺憾，且更有必須以國文創作才有顏面見祖先的喟嘆，則倘若參照龍氏真誠的自況，這毋寧恰恰反映了戰後初期國語運動入人之深，且實際與臺灣文學關係匪淺。究竟，戰後新興的「國語」、「國文」，對於臺灣作家到底是噩夢或美夢？何以竟會讓本來專擅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刻骨銘心的念茲在茲？從語文載體到創作心靈，戰後初期的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學與作家們，又意味著什麼？

其實早在《新生報》「橋」副刊論戰時期，出身福建漳州的戲劇家陳大禹（1916-1985），便敏銳察覺到這股因為強烈國語文學習的需

<sup>7</sup> 嚴家淦演講內容，參見張博宇編：《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204-205。又，認為臺灣國語運動表現優異者，洪炎秋亦持相同看法，他在〈十年來的國語運動〉一文中，說明臺灣推行國語的四種有效途徑，包括（一）利用廣播、樹立標準；（二）舉辦講習，訓練教師；（三）編印書報，供給參考；（四）師範課程，加重語文，並以《國語日報》的發行為例，言及：「以前大陸上各地方，也曾經發行過幾次的注音日報，都是壽命不長，不久就告夭折，只有臺灣的這份國語日報，發刊以來，七易寒暑，不但屹立不動，而且好像是可以永久生根發育下去似的，這也可以認為是臺灣國語推行成功的一個表現。」參見洪炎秋：《癡人癡話》（臺中：中央書局，1964年），頁97-101。

<sup>8</sup> 「國文」此一辭彙在戰後指涉著不同意涵，此處依照文脈與語境，應是源於國語運動中的常用語，參照魏建功說法：聲音形體排列組合表達出全部的思想叫「國文」，而龍瑛宗所言「國文」當是由此而來。參見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現代週刊》第1卷第9期，1946年2月28日，頁9。

求，所連帶形塑出來的臺灣文學特殊性面貌，他以爲：「現在臺灣發表的文作，在功能上，有其異於國內，特別強明的語文教育性，現在臺灣人因語文的變革，對於祖國語文正如白紙一樣要從報刊接受，學習，他們的閱讀，不僅是國內偏重於內容的理解，同時他們還要實際引用到生活需要表達的日常語文上去，所以，現在臺灣的文作，因爲這種需要，我們應強調這種特殊性，使能適宜於這特殊的需要。」<sup>9</sup>以上，陳氏的細膩觀察，提醒了戰後初期臺灣文學中的語文變革性，如何因爲需求性與實踐性，遂又轉而成爲臺灣文學自身的特殊性；如此一來，無疑也指出了若要探索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真正面目，勢必不能忽略當時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之間正在孕生的共構關係。

面對上述情形，我們應當注意戰後初期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學而言，不只因爲語言轉換而出現過「被詛咒文學」<sup>10</sup>或「跨越語言一代」<sup>11</sup>的被壓迫困境，也應正視如龍瑛宗想要以國文書寫的熾熱欲望與堅持執念，以及陳大禹所謂的應運而生的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特殊性樣態，由此可知歷經日人統治後的臺灣文學作家，對於戰後初期「國語」之學習與使用，其實有著錯綜複雜的情感結構與曖昧糾葛態度，甚至會醞釀出不同以往的文學本體風貌，產生新的文學秩序重構，是故如何重新思考而給予周密的評述，顯然猶待著墨與刻劃。因此，在本文中，有鑑於過往有關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後殖民論述，已經累積不少可觀成果，<sup>12</sup>且清楚揭示從「日文」到「中文」的語言斷裂性，

<sup>9</sup> 參見陳大禹在《新生報》所舉辦「如何建立臺灣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中的發言，文見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年），頁63。

<sup>10</sup> 王育德在1946年的〈徬徨的臺灣文學〉一文中，傷感地以爲學會國語的同時，從前的小說家已被遺忘，甚至被取代，因此而有「感覺是深受詛咒的文學」的喟嘆；晚近陳建忠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研究著述，逕以「被詛咒的文學」爲題，便頗有爲該階段文學歷史定調之意味。

<sup>11</sup> 1985年，林亨泰〈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談起〉一文，曾以「跨越語言的一代」，指涉戰後陷入日、中兩種異質文化語言轉換之間掙扎、煎熬者的內心情境與能動狀態。

<sup>12</sup> 例如葉石濤、彭瑞金、陳芳明、游勝冠、陳建忠等人之相關著述，皆曾從



乃至鮮明描繪了臺灣文學的苦難歲月，故在此，將試圖改由不同視角出發，去側觀戰後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學發展的若干影響與刺激。而本文所要留心的是，從日治時代到戰後階段，當「臺灣文學」轉而成爲「中國文學」時，因爲「國語」的緣故，兩造文學之間所曾開啓的以「國語」爲基礎的文學「嫁接」狀態及其相關衍生語文問題。

那麼，爲何「國語」會成爲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行「嫁接」的重要基點？首先，先就「嫁接」此一關鍵詞來說。所謂的「嫁接」，原指將不同植物接合在一起，以使成爲一株新植物的繁殖法，在此挪用以描述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行接觸、接軌的動態情況；這是因爲臺灣在日人長期統治下，由於日語與中文的衝突性，致使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成爲異種，故若要重新合爲一體，顯然需要經由嫁接程序始能成事。而事實也證明，透過戰後初期各種文學論域的交鋒爭辯，可知時人並非不知曉1920年代臺灣曾經發生過以北京白話文爲書寫工具的中文創作現象，以及同樣具有漢字「同文」性特質的臺灣古典文學書寫，但即使如此，在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創作仍然遭到許多質疑與挑戰，因爲在「文字」之外，猶須追求「聲音」與「文體」的標準化，過去臺灣本省古典文人的漢文寫作或中文作家的北京白話文的「同文」性條件，實際還不足以使雙方文學順利進行合宜、理想的嫁接，一切最終仍須仰賴「國語」中介的出現。因此，在戰後初期，臺灣唯有透過「國語」的實地操作，才能真正達成「言文一致」的現代中國文學書寫要求，而如此雙方也才有了可以嫁接的空間與基礎，進而重新磋商戰後初期正宗的文學典範與文學典律。

於是，當如火如荼的國語運動風潮展開之後，隨著國語運動的普及性、強制性，語言改革成爲公共話題，文學領域同受薰陶，對於臺人而言，舉凡「國音」的養成、「國文」的書寫、「文法」的熟悉，便會從日常語言漫衍到文學語言，強力促使臺灣文學產生與時俱進的

---

後殖民視角檢討臺人作家在戰後初期歷經語言轉換的艱辛痛苦，各文已有許多精彩發揮。

質變，其中尤以國語的讀音標準化、國家化，國文書寫的一致化、統一化，到文學所背負的宣揚民族主義、國家精神的啓蒙化，上述種種終為臺灣文學帶來革命性的嶄新意義，並漸次改變臺灣文學的創作典律。於是，由日治時期到戰後階段，從「日文」到「中文」，從「漢文」到「國文」，從「文言」到「白話」，經由國家強力動員而定於一尊的「國語」，將會陸續引爆文字讀音、文體書寫、文學秩序、文學場域的不變，促使戰後臺灣文學進入一種迥異於日治時期的新狀態，而這也正是本文何以要去特別關注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學所引起的「聲音·文體·國體」三方面的交互作用現象，<sup>13</sup> 期盼藉此能得以釐析出更為完整的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樣貌。

## 二、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

誠如上述，戰後臺灣發生了一場國語運動，這是一齣由中國舞臺漫衍而來的成功劇碼，其中相關國語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或理論體系的建構，<sup>14</sup> 乃至語文報刊的創立，<sup>15</sup> 大抵是由中國國語運動延伸、借

<sup>13</sup> 本文以聲音、文體與國體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力，藉以描述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之間的關係性，而在「聲音」方面的討論，將會涉及國語的聲音系統、表記方式與方言問題；「文體」方面的討論，則會觀察國語的文法與言文一致書寫方式的要求，對於臺灣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刺激與影響；至於「國體」一詞，最早出自《管子·君臣》，乃指君臣父子五行之官，故基本上此一辭彙有組成國家要素之意，而由於國語是現代化、統一化的國家語言，故在戰後初期以國語文寫出具現代化啓蒙思想，且符應國家民族精神的文章，實為當時創作之主要趨勢，因此遂觸及了國家「國體」的營造與提升。綜上，大抵可知本文题目的論述旨趣所在。

<sup>14</sup> 國語教育的問題，是一個涵蓋整個中國的全國性、長期性問題，從1912年在北京組織的「讀音統一會」，1917年以蔡元培為首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1919年教育部成立專管機構「國語推行委員會」，堪稱歷經了各階段的推動與推行，而到了1944年3月教育部更在重慶印製《國語運動綱領》以通行全國，洎自戰後初期，這份綱領自然也成為臺灣推廣國語運動的基本政策。以上參見吳仁華：《臺灣光復初期教育轉型研究（1945-1949）》（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230。

<sup>15</sup> 例如《國語日報》之創設，是1948年3月間，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臺視察

鏡而來，不過也有配合臺灣在地環境的因地制宜之處，此可以魏建功（1901-1980）將臺語方言做為學習國語的方法論最具代表性。

有關臺灣國語運動的開啓與發展情景，目前相關論著不少，例如許雪姬便曾經藉之擴大探析臺灣戰後語文問題及其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sup>16</sup>而一般研究者多數係進行國語運動之歷史研究，所論包括：國語推行機構組織之設置、相關人員工作分派、推行機構改組裁併，以及國語會工作項目與實行內容等，如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已有完整說明。<sup>17</sup>其中，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組織成員方面，主委魏建功的事蹟尤受重視，如黃英哲對於魏建功來臺原因、在臺撰寫有關國語運動之著述目錄、所擬臺灣國語運動綱領，以及其所任職的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內容，進行了極有條理的歸納與彙整；<sup>18</sup>其後，梅家玲又在此文基礎上，詳細討論了魏建功在辭去為期一年半左右（1946年1月—1947年6月）的主委職務之後，改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而在臺大學院中推動國語文教育的概況，以及與吳守禮合作編選臺大語文教本《大學國語文選》的內容及意義，<sup>19</sup>故能裨益掌握魏建功在臺時期致力於國語文教育的整體歷程。

除了上述之外，其實中國學者的討論亦匪鮮，他們或基於臺灣語文／教育問題的研究興趣，或因留心「光復初期」社會文化情形，故

---

臺灣國語運動成效，深覺滿意，因此將在北平發行的注音國字三日刊《國語小報》搬到臺灣，改為日刊而來，參見洪炎秋：〈國語日報十五年〉，《癡人癡話》，頁43-44。

<sup>16</sup> 參見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第29卷第4期（1991年12月），頁155-184。

<sup>17</sup> 張博宇編：《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臺北：國語日報社，1965年）。

<sup>18</sup> 參見黃英哲：〈言語秩序的重整——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41-64。

<sup>19</sup> 參見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7期（2010年2月），頁125-160。

連帶會對戰後初期臺灣國語運動進行剖析，前者例如吳仁華《臺灣光復初期教育轉型研究（1945-1949）》第7章〈臺灣光復初期教育語言及內容的轉換與教育轉型〉，便從教育研究視角，說明國語運動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推廣情況；<sup>20</sup> 後者如宋幫強〈論光復初期的臺灣國語運動〉、許長安〈光復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此二文是福建閩臺緣博物館為紀念臺灣光復65週年所辦「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之作，文中不約而同針對臺灣國語運動的實施概況及其意義，做了簡單描述與鋪陳。<sup>21</sup>

至於目前之最新研究，可以日本於2012年出版的菅野敦志所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為代表，此書從「脫日本化」、「中國化」、「本土化」角度出發，探討1945年至2010年臺灣語言、文字政策的變化史，並且涉及了國民黨語言政策、共產黨語言政策、臺灣母語教育政策的角力與交涉現象，以及朱兆祥、羅家倫、蔡培火等人的語文觀點，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交錯對話之中，展示了臺灣語言政策的變遷樣貌；<sup>22</sup> 換言之，由此可知書中有關戰後初期臺灣國語運動的探索，乃從語言政策的考察入手。而該書的第1章〈「光復」と脱植民地化の現実——国語、方言、そして日本語〉，便探討了戰後初期的臺灣國語文問題，內容首由日治時代日文同化的國語教育論起，次而闡述1945年後脫殖民地化的語言轉換風潮，並介紹國語推行委員會所推動方言復歸活動，以及報刊廢除日文欄的情形與臺人反應，又輔以魏建功、何容、陳文彬、姜琦……等人言論，<sup>23</sup> 大抵史料豐富而多元，所述值得參看。

<sup>20</sup> 參見吳仁華：《臺灣光復初期教育轉型研究（1945-1949）》，頁229-236。

<sup>21</sup> 參見楊彥杰主編：《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頁204-227。

<sup>22</sup> 參見菅野敦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12年）。又，筆者在進行本文定稿前夕，能適時得知此部新書訊息，乃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松浦恆雄教授所告知，特此致謝。

<sup>23</sup> 參見菅野敦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

綜上可知，相關戰後初期國語運動的研究路徑與關懷面向，其實並不一致，亦與本文專就臺灣文學與國語運動關係性之著眼有別，但儘管如此，瀏覽各篇仍可發現臺灣國語運動之諸多現象，實已獲致相當程度的考掘，特別是如國語運動之發展沿革，或各機構、組織行政運作狀況，乃至國語推行委員會重要人物言論之介紹等，故在此對於若干議題便不再細究，而僅就與本文問題意識有關，或仍有說明辯證之必要者，才再加以闡述。

### （一）全臺風起雲湧的國語推行運動

細繹臺灣之所以推行國語運動，首先應當溯源1945年教育部所設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該會由吳敬恆擔任主任委員，黎錦熙、沈兼士、魏建功為常務委員，蕭家霖、何容、周炘為專任委員，胡適、傅斯年、朱自清、羅常培、王力、齊鐵恨……等人為委員；而同年由於與日本作戰勝利在望，中央著手規劃接收與收復計畫，因此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亦派員參加準備工作。而就在臺灣光復之後，最高統治機關「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立，因為有感於國語推行工作十分重要而繁難，遂向教育部請求派員協助，為此，教育部指派了魏建功、何容等人於1945年11月來臺，並籌設「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的「國語推行所」。1946年4月2日，「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隸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轄下，由魏建功出任主任委員，何容為副主任委員，方師鐸、齊鐵恨、王玉川、李劍南、孫培良為常務委員，吳守禮、王炬等人為委員；後來委員又有續聘，王壽康、洪炎秋、梁容若、黃得時等人亦獲選為委員。<sup>24</sup>而從委員名單中來看，多數委員出身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但也加入了少數熟悉臺灣教育環境的本省人士如吳守禮、洪炎秋、黃得時等

---

革》，頁15-49。

<sup>24</sup> 以上所述參見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頁113、117-118。

人。自此，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積極努力之下，就此掀起臺人國語學習之旅的序幕。

有關臺灣的國語學習，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運作之前，其實已經開始，各式國語教學方法與教科書紛陳，有的甚至還將戰前日人所編中華國語教科書重印使用，<sup>25</sup>就在這種慌亂或稍嫌荒謬的景象中，陳儀在抵臺兩個月之後，經過一番實地勘查瞭解各項問題，他在1945年除夕進行公開廣播時，對外宣告要將國語的學習納入民國35年度的心理建設工作項下，並明確指示推行方向：

心理建設，在發揚民族精神。而語言文字與歷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臺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臺灣同胞，必須通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明年度的心理建設工作，我以為要注重於文史教育的實行與普及。我希望於一年內，全省教員學生，大概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學校既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要再說日本話，再用日文課本。現在各級學校，暫時應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為主要科目，增加時間，加緊教學。<sup>26</sup>

於此可以發現，陳儀是將國語學習與民族主義、學校教育相互連結，而除了彰顯出學習國語與國家意識形態形塑密切關連外，也能夠得知學校教育的強力配合情形。事實上，國語學習運動既與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多所攸關，這就絕非僅是學校教育之重點而已，從目前可見的戰後初期各種文獻史料來看，這場在臺灣風起雲湧的國語推行運動，其實堪稱全民運動，無論是黨政軍系統，或是省級、縣市單位，均設有相關教學機構，其中包括了官民階級、左右翼派系、<sup>27</sup>初等到高等教

<sup>25</sup> 參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44。

<sup>26</sup> 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印：《陳長官治臺一年來言論集》（臺北：臺灣新生報印刷廠，1946年），頁44-45。

<sup>27</sup> 學界早已注意到戰後初期左翼作家如楊逵、呂赫若的國語文創作實踐，



育，<sup>28</sup> 本省人與外省人莫不與役，洵然一片「國語熱」。<sup>29</sup> 此外，從首都臺北到時屬邊陲的花蓮地區，<sup>30</sup> 各地報刊莫不刊載相關國語學習、指導之訊息，<sup>31</sup> 而廣播媒體更設有固定節目予以講授，並且刊出以饗讀者與聽眾，<sup>32</sup> 率皆可見其全民化、區域化、地方化之情景。

或是《人民導報》上相關國語運動訊息的刊載，卻忽略了當時的右翼組織對於國語運動亦頗為投入，例如由柯遠芬主持的「正氣學社」就設有函授班，其招生簡章可見於《正氣月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1月），頁70，內容如下：「一、本社為便利社會人士繼續進修起見，特設函授班，俾遠道青年及在校之學生與在職之公務員，皆有繼續進修之機會。二、函授班暫分國文國語兩科。三、每星期由本社寄發講義，並指定參考讀物，每月由本社命題作文一次，由本社講師批改寄還，並將佳作選載《正氣月刊》。」

<sup>28</sup> 有關學校教育系統中各級學校之推行國語運動自不待言，但其中也頗不乏學生集體自發性之學習行為，例如戰後初期第一份學生刊物《臺灣學生》（創刊於1946年12月1日），依其發刊宗旨，可知係為聯合臺灣學生建設臺灣新文化堡壘，以及共同推行國語、國文而設。有關此刊物之發現及相關訊息，承蒙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溫席昕同學提供，特表謝意。

<sup>29</sup> 參見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頁160。

<sup>30</sup> 從花蓮戰後初期首份地方報紙《東臺日報》來看，可以發現由1946年4月起便出現許多報導花蓮各地方單位與學校推行國語運動的訊息，包括民眾班、公務班、女青年講習班相關學習資訊或各式競賽活動狀況均刊載其上，此外尚有國語推行員、學員投書表達意見，足證花蓮地區對於國語運動反應熱烈。更詳細情形可以參見楊富閔：〈戰後初期（1945-1949）花蓮地區語文學活動之「中國化」現象：以《東臺日報》為觀察場域〉（花蓮：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會議論文，2011年9月24-25日）。

<sup>31</sup> 包括黨政軍系統之報刊，以及臺人自設新聞媒體均可見大量報導，例如《臺灣新生報》、《中華日報》、《民報》、《人民導報》、《國語日報》、《現代週刊》、《日月潭週報》、《和平日報》、《新新》、《臺灣文化》等，而藉此亦可瞭解陳儀所謂國語學習運動須以「剛性」方法推動，此由報刊之紛紛刊載，各種協助運動之進行，是亦可見一斑。

<sup>32</sup> 例如《臺灣之聲——自由中國之聲》便長期刊載國語文之講座內容，包括1946年8月1日〈國文講座〉；1947年3月1日〈中等國語講座〉、〈國語發音示範節目內容〉；1947年7月1日〈國語讀音示範〉；1947年9月1日〈國語音示範〉；1948年1月1日〈國語講座〉；1948年2月1日〈國語發音示範〉、〈中國文字的構造〉；1948年3月1日〈國語讀音示範〉；1948年6月1日〈國語讀音示範〉；1948年10月1日〈國語讀音示範〉；1948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紀念特大號〈國語讀音示範〉……等，文章頗多，不勝枚舉。又，關於以廣播方法學習國語，楊村在上海《文匯報》所刊〈臺灣的文化〉一文〔收入李祖基編：《「二·二八」事件報刊資料彙編》（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頁182〕，認為：「台灣文化教育的一

而上述全島集體動員的盛況，也彰顯了戰後初期國語學習管道之豐沛，王潔宇〈學國語〉詩歌如是說：

學國語，真容易；講演會，國語班，收音機，機會千萬莫放棄！

說國語，也容易；只要常常講，笨伯也可說流利。

看書籍，也容易；國語書報到處有，一有時間你便去！

國語文，也容易；只要勤練習，白紙黑字你也可以寫一氣！

學國語，貴傳習；自家習了還不算好，大家都會才真歡喜！

學國語，貴傳習；一傳十來十傳百；千千萬萬都會說國語。

學國語，要努力；即學即傳，國語能真普及！只要有機會，千萬莫放棄。<sup>33</sup>

從講演會、國語班到收音機，還有到處都有的國語書報，可見戰後初期臺灣國語運動的推行十分徹底，只要「一有時間」則無處不可學習。其次，在詩歌中，另一個被強調的重點為「傳習」，傳習才能促使國語更為普及。

## （二）國語運動的理念與理論

那麼，如何促使「傳習」更加普及？而自家練習又該怎樣行動？整個國語運動的理念與理論何在？對此，自然應先聚焦「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魏建功、何容，齊鐵恨等人，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成員的情況，上述諸人當時莫不戮力投入廣播與報刊中，積極從事相關論述的發表。例如由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後任臺灣省圖書館館長的吳

---

個特點是廣播教育的發達。……現在的臺灣廣播電台，恐怕也還是中國播音台中最忙的一個，由清晨六點……直到午夜……，一天十二小時，沒有一刻停止播音。當局用這來推行台灣同胞的『國語教育』很著成效。」不僅強調此法的功效，而且指出在執行上臺灣比中國其他地區更為積極。

<sup>33</sup> 參見王潔宇：〈學國語〉，《新生報》第490號，1947年2月26日。



克剛主編的《現代週刊》，在1945年12月10日創刊到1946年12月25日停刊的一年間，雖然發刊宗旨清晰標舉乃以闡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為要，但也屢屢登載與國語運動有關篇章，如第1卷第9期有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文章復原由言文一致做起〉（1946年2月28日）；第1卷第12期魏建功〈臺語音系還魂說〉（1946年3月31日）。而到了第2卷第3期的〈本刊啓事〉（1946年5月10日）中，更特別說明：「鑑於國語國文之推行，在本省甚為重要，爰請魏建功、何容、章雪村諸先生主持國語及國文專欄」。果然，從第2卷第4期便有何容〈國語裡的部位詞〉（1946年5月20日）；第2卷第7、8期合刊魏建功〈怎樣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何容〈國音的聲調和聲調符號〉（1946年7月20日）；第2卷第9期魏建功〈國語常用「輕聲」字〉（1946年8月14日）；第2卷第10期魏建功〈國語常用「輕聲」字（下）〉（1946年8月28日）。以上，透過文章發表題目，可以概知論述要義，以及國語運動推行重點所在。

當然，「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更具系統性的表述與言說，自是集中在行政長官公署之機關報《臺灣新生報》上，而該報也於1946年5月21日關設了「國語」專刊，相關原因與背景在〈發刊詞〉中做了清楚敘述：

新生報爲了達到建設新臺灣的使命，逐漸把報紙的形式和內容改進，最近做到增加副刊的工作。適應本省的需要，本刊就成了一個「當然」的副刊。我們省內外人士，一到勝利收復失地的時候，誰都很快的覺得這裡迫切需要「國語」。究竟所謂「迫切」的需要是什麼？而且迫切「需要」的國語是什麼？和「怎樣」來完成這迫切需要？這些問題，本刊希望做個公開討論的機關刊物。原來在抗戰之前，北平有一個「國語週刊」，初期是京報的副刊，由故錢玄同教授主編；後期是世界日報副刊，由故白滌洲先生和何容先生編輯，它的性質是當時從教育

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直到國語推行委員會發表研究審查討論宣傳等文件的刊物，本刊現在也可算得本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跟社會取得聯繫，互相研究討論的機關刊物。<sup>34</sup>

上述文字，明確指出了《新生報》「國語」專刊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其編輯理念乃因襲北平《國語週刊》而來，<sup>35</sup>目的在於曉諭臺灣大眾有關國語運動的真正意涵和學習方法論；那麼，不難想見，此刊創立之後，魏建功等人自是就此大加利用，汨汨不絕展開國語運動之重要論述。目前，在「國語」專刊成立前，可以發現魏氏於1946年5月6日發表的〈國語的德行〉一文，成立之後，則至少可見〈國語運動綱領〉、〈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國語〉、〈國語的四大涵義〉、〈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談注音符號教學方法〉、〈學國語應該

<sup>34</sup> 參見〈發刊詞〉，《新生報》第209號，1946年5月21日。

<sup>35</sup> 此處不僅提醒研究者，《臺灣新生報》「國語專刊」與北平《國語週刊》之間所顯示的臺灣、北京相關刊物的關連性，同時還昭示若干人物的語文觀念對臺影響關係，包括錢玄同、白滌洲，乃至何容來臺前後言論的承續發展意義。而值得一提的是錢玄同，姑不論他與白滌洲、魏建功因為有著師生關係，而會對戰後臺灣國語運動的理念、理論產生影響，其實在臺灣戰後初期，就有人主張向錢玄同的學術思想學習，如殷塵〈錢玄同先生的學術思想〉所述：「臺灣是我們實現理想的處女地，一切我們都可從頭起，不論治學和從政，非袂去陳腐不可，……在臺灣辦教育的人們，尤其是國語推行委員會中諸先生，我想照我們現在國家的情況和一般人的頹唐來說，如玄同先生尚在，我們是不敢正面對他望一下的。後人的義務是踏著前人的腳跡前進，……。」參見殷塵：〈錢玄同先生的學術思想〉，《圖書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0月），頁10。而此文發表時，負責編輯工作的劉滿子，在同頁中也附記說明：「殷塵先生是最欽佩，最贊成錢先生的思想的，他來臺灣已五個多月，以臺灣剛光復，沒有國內腐敗陳舊社會的劣根，可以乘從新做起的好機會，照錢先生的主張好好地建設起一個新臺灣。比方：一，推行國語 二，廢止文言文 三，杜絕封建思想的流入，這三點是玄同先生早就主張實行的，但在國內因種種積習難移，直到現在未能完全實行，現在臺灣光復後，文字語言得從新改革，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像一個剛懂人事的孩子，應當殷殷誘導他，使他的思想行動納入正規的路上前進。本人知道殷塵先生很有這樣深謀遠慮的思想，所以催促他把這篇文章在此發表了。」於此可知劉滿子亦認同殷塵想法，以及錢玄同學術思想在臺灣戰後初期的引導性意義。

注意的事情〉、〈國語辭典裡增收的音〉、〈臺灣語音受日本語影響的情形〉、〈日本人傳訛了我們的國音〉、〈學習國語應重方法〉、〈關於交際語〉等，這些文章分別發表於「國語」專刊第1期至第11期，以及第15期、第18期上。<sup>36</sup>

那麼，作為臺灣國語運動的主要論述人，魏建功究竟如何針對臺灣需求進行理論撰寫？在剖析魏氏意見之前，先再補述上引「國語」專刊發刊詞的另一段話：

國語運動在我國還算是一種社會運動，始終沒有得到政府的徹頭徹尾的用政治力量嚴厲執行過。如果把這一點基本事實忽略了，我們就會文不對題。……國語運動的歷史也有了五十年，它的成效多得之於自然發展，……。<sup>37</sup>

此處指出了極為重要的關鍵點，即中國國語運動乃屬一種社會運動，是以自然發展的姿態前進，並非出自政治力之引導。果如此，《臺灣新生報》藉由此段敘述，顯然想要澄清刻正推廣中的臺灣國語運動，其實一如中國境內過去之執行，是在自然狀態中運作，絕無受到政治力的強力介入。

不過，若再回顧前曾述及的全島熱潮，其間固然不乏臺人自己的「國語熱」，但面對現實生活，陳儀所謂一年內教員學生能說國語、通國文，與學校不說日文的政策，或1946年10月25日報刊廢止日文欄等措施，則臺人焉能不感受政治力之干預，否則文學家又何以出現「被詛咒文學」之悲嘆？何況，這種政治力不僅出現於公署官方勢力中，當時的軍隊中同樣也有學習國語之迫切性，軍方也主動扮演國語運動的推行人角色，例如由憲兵第四團諍友報社編，李武忠、陳出新編著的《臺胞國語補習課本》，在該書〈例言〉中，有言：（一）本

<sup>36</sup> 有關魏建功在《新生報》「國語」專刊第15期與18期文章，筆者未見，此處篇名參考黃英哲前揭文補入，頁50。

<sup>37</sup> 參見〈發刊詞〉，文載《新生報》第209號，1946年5月21日。

團爲補助臺胞學習國語起見，特於駐地分設國語補習班，由本團官兵擔任教學，因苦於無適當課本，特編印此書，以供應用。(二)本書編輯主旨，在介紹祖國文化，以及三民主義的思想，用以激勵臺胞向心祖國，而加強其建設新中國與新臺灣之信心。<sup>38</sup>顯見在軍中學習國語，更與認識祖國文化、三民主義思想，建設新中國的責任緊緊聯繫。所以，在國語運動推行已達二十五年後，前曾述及的嚴家淦，在1970年演講中，仍然認爲臺灣國語運動「爲什麼推行得這麼好呢？……最重要的還是可以說我們臺灣的同胞都是愛國，我們臺灣同胞國家觀念非常之深，所以臺灣同胞雖然經過五十年的異族統治，但是他的愛國心，他的國家觀念還是至高無上的，所以有一個機會提倡國語國文，紛起響應，一下子那就提倡好了。……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國語，統一的國文，中華民國立國的基礎才能夠穩固。」<sup>39</sup>由於「國」語的本質，故被界定爲國家統一的根本，而與愛國意識、國家觀念相結合，則如此的語言政治威權，如何能使臺人不急速由日語轉換爲國語？以嚴家淦講述這番話的時間性而言，尙且充滿高度政治張力，遑論戰後初期的不安情境。

於是，該深思的是，在國家統一、國家至上的氛圍中學習國語，要如何才能使得新收復的臺人心情轉危爲安，甚至歡欣進行學習？魏建功從先前長期參與中國國語運動改革的豐富歷練中，自能理解臺灣國語運動與中國原本所謂非政治力嚴厲執行的「社會運動」形態不同，這才是他必須建構一套合宜、合理的臺灣國語運動理論的難處，而從目前所見魏氏多篇文章中，也的確清晰流露出其人曾經爲此多所琢磨。關於此點，刊載於《新生報》上的〈國語的德行〉正是對於臺人說之以理的關鍵篇章，由於過去未見闡釋，故文雖冗長，亦特摘錄要點於下：

<sup>38</sup> 參見憲兵第四團諍友報社：《臺胞國語補習課本》（臺北：民報社，1946年），頁1。

<sup>39</sup> 參見張博宇編：《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205-206。

我國推行國語是建造民國以前的發動的事，何以到現在標準還沒有樹立起來？這是我說過國語的特性的表現。我們國語標準的形成是文化的自然演變，它的推行也靠著文化自然的發展；……我們民族有一種豁達大度，它的來源與孔子人生哲學裡的「恕」有關係。……我們的語言標準系統也就是從這種處世哲學裡陶鑄成功的。……這種標準系統既然在北平慢慢成長，剛巧從北平散到四方去擔任行政的官員，他們就爲了使得四方人民能瞭解他們的意志，便自然把它帶到各地去。因此，人們叫它做「官話」。「官話」並非是「官說的話」的意思，這個「官」字應該當做「官私」的「官」來解釋，也就是「公共」的意思。因爲我國的語言極爲自由而平等，不像日本語，長輩與晚輩，上官與屬僚，官吏與人民，男子與女子，中間有用不用敬語的分別。……我們標準語行用，雖說發動於「官」，實在並沒有嚴酷的「官□（案：字跡不明，無法判斷）」和齷齪的「官味」！……推行國語不僅是口頭語音形迹改變，還要有民族德行善良之涵養。……近來有人說，國語將被要拿它作「干祿」工具的人們所厭棄而不學習。我因此特地說明，國語之名官話，與會國語便可當官的功利主義是不相干的。……當然是要「能說國語而爲國家服務」的，並不是存著「說國語好做官」的心理的。我們的國語推行，在臺灣是一個「文化復原」的運動，並非如日本人要毀滅我們的性靈，歪曲我們眼光，而施行的「文化政策」。……我們要藉著國語的優點，教臺灣地方與闊別了五十一年之祖國聯繫一體，首先讚揚國語的德行，養成民族的「恕道」；由「恕」到「忠」，自然從「尊崇標準國語，平等看待方言」二事做起。若是自己也許沒有想徹底去行用標準音促進標準語的實現，而要別人家語言標準化，甚至於認爲可以消滅人家的語言，那就是沒有明白什麼是標準化的意義。……我們的標準語之所以成爲標準，純語

言學術觀點以外，最主要由於它富有一種德行涵養的表現，這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們觀察本省國語實際推行的辦法要：本省人從自己方言裏找對照學習國語的途徑，外省人各自儘量用標準音說話，老老實實，大家向標準走去，共同樹立標準的風氣。坦白說，全國國語實際情形都還在方言交涉裏掙扎。這個掙扎會一天一天自然得到最後成功的。站在同一語系的立場上，是沒有哪一種方言可以消滅另一種方言的；譬如同祖數支的家族，標準語不過是「大宗」，而方言是「小宗」而已。<sup>40</sup>

在這篇文章中，魏建功首先訴說中國國語的「標準化」，乃係歷經漫長時間的自然結果，並指出這種標準化是奠基於孔子的「恕道」哲學精神，故是在不帶強制性與壓迫性之中逐漸醞釀生成的，而此處所論或許是有感於時人對於國語之講究標準化感到壓力，遂不得不予解說。其次，論及國語之標準化，他從北京官話說起，但又恐時人對於官話一詞有所誤解，故魏氏在說到這種標準系統乃由北京官話而來時，也特別澄清「官話」是指一種具有公共力的話，不是當官者的話語，因此沒有階級性與官宦味，也無法以此追逐功利，蓋屬於一種自由平等的語言，此尤其與具分別性的日本語或帶有毀滅性色彩的日語政策不同。其三，國語既是一種具德行的語言，故在實施標準化的追求時，並不會消滅方言，而會平等看待方言，且鼓勵本省人從方言裡找出對照國語的學習途徑，大步向標準化邁去。

以上，魏建功文章所高度關注的國語問題，並不是在為「國家」對「國語」的宰制力與齊一性解套，反而是在語言的「標準化」上議論立說，他顯然察覺到國語的「標準化」給予臺人一種威脅感與暴力性，故特別拈出「恕」字，說明中國國語的標準化乃是自然慢慢形成的歷程，藉此以避免突然要求臺人使用標準化國語時，會有無法適應的壓迫感。此外，他更要大家尊重與善用臺灣方言，而這既為本省人

<sup>40</sup> 參見魏建功：〈國語的德行〉，《新生報》第194號，1946年5月6日。



士找到學習國語的方法論與方便門，也同時化解在各界追求國語標準化過程中方言角色的尷尬與衝突。至此，如何闡述臺灣方言以成爲學習國語的捷徑，自是魏建功後續相關論述的精萃所在。

### （三）以方言學國語及注音符號論

但，爲何魏建功會特別強調以臺語來學習國語呢？究竟又要如何付諸實踐呢？其實從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制訂的六條「臺灣省國語運動綱領」，便能有所掌握。綱領內容如下：

- 一、實行臺灣話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
- 二、注重國音讀字，由「孔子白」引渡到國音。
- 三、刷清日語句法，以國音直接讀文，達成文章還原。
- 四、研究詞類對照，充實語文內容，建設新生國語。
- 五、利用注音符號，溝通民族意志，融貫中華文化。
- 六、鼓勵學習心理，增進教學效能。

其中的前三條，即是考慮到臺人過去的日文教育背景而設，而這也正是魏建功爲何要由方言去新擬學習國語的方法與途徑的用意所在。他在〈國語的四大涵義〉，指出「國語」不是「本國現行標準語」一義所能含括；<sup>41</sup>又在〈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中，<sup>42</sup>明白談到臺語就是國語的一種；另在〈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一文中，強調方言和國語是由一種語言演變而成的不同支派，彼此的語法是大致相同的，並不像兩種不同系的語言的音那麼毫無關係，故他以爲保存方言，用比較方法來學習國語，對於推行國語是有幫助的。再者，日人統治時期，既爲推行日語而對臺灣方言產生破壞性，故今如若因爲推行國語而再次捨棄或消滅臺灣話，尤屬不該。因此，在當下更應設法

<sup>41</sup> 魏建功：〈國語的四大涵義〉，《新生報》第223號，1946年6月4日。

<sup>42</sup> 魏建功：〈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新生報》第244號，1946年6月25日。

恢復被日本攪亂變質的臺灣話，使其重新復歸方言地位，亦即使「臺灣話復原」，如此可使臺人的鄉土文化獲得發揚，民族意識復原，也能藉此對照學習國語。簡言之，魏建功之所以不直接追求國語標準化，其目的是爲了要徹底恢復臺人民族意識，以求進一步建設真正學習心理，<sup>43</sup> 而要在如此的步驟之後，才去鑽研國音讀法、注音符號、新生國語等面向。

正因爲魏建功心中想要藉由臺灣話的保存與重新利用，來恢復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以便能真正學習標準化的國語，故遂使得國語推行委員會之工作頗感迂曲，但這種經由臺語進到國語，即「招臺灣魂，做國語夢」<sup>44</sup> 的方式，在推行之初，就已引發不少爭議，例如張芳杰〈論從臺灣話學習國語〉就提出爲何要復原臺語，才學國語，難道不能直接學習國語嗎？<sup>45</sup> 也由於社會已經出現了如此的誤會，何容在〈「從臺灣話學習國語」序言〉中，才會開門見山地解釋：「從臺灣話學國語，是指會臺灣話的人說的，並不是說不會臺灣話的人要先學會臺灣話，再學國語。」<sup>46</sup> 另外稍晚數日，又在他文〈推行國語和恢復方言〉再做闡發：

國語這個名稱，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是本國的語言，另一種意義是國定標準語。就前一種意義來說，國語是跟外國語相對的；就後一種意義來說，國語是跟方言相對的。推行國語，就是推行國定的標準語；但是在本省推行國語，同時又有推行本國語的意思，因爲本省大部分人從前都說外國語（日語），而且有一部分人不會說本國語，連方言都不會說，本省現在推

<sup>43</sup> 魏建功：〈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第276號，1946年5月28日。

<sup>44</sup> 魏建功：〈國語的四大涵義〉，《新生報》第223號，1946年6月4日。

<sup>45</sup> 參見張芳杰：〈論從臺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第244號，1946年6月25日。

<sup>46</sup> 參見何容：〈「從臺灣話學習國語」序言〉，《新生報》第244號，1946年6月25日。



行本國語，當然是要推行標準語，這是毫無問題的；可是恢復本省方言，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光復以後，本省還不會標準語的都不愛說日本話而愛說本省話了，這不就是恢復了嗎？這是必然有的事實，用不著提倡，也沒有方法反對。標準語並不是一光復立刻就能學會的，那麼在那還沒學會標準語以前，既不能停止說話，又不願意再說日本話，請問除了恢復本省話，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我們提倡恢復本省方言，不過是希望社會上承認這件事是合理的，並非僅僅出於不得已。<sup>47</sup>

何容這篇文章對於「國語」的多重意涵，以及與臺灣方言之間的關係，國語推行委員會選由方言學習國語的理由與正當性，再度進行捍衛式的申解，尤其文末特別說明以方言學國語並非出自不得已，希望社會承認合理性，如此則更可見何容與魏建功等人的國語運動論述必然遭逢許多疑惑與挑戰。

不過，魏建功與何容對於臺灣話這種方言的看重，還是贏得了若干臺籍人士的喝采。1946年4月21日《人民導報》刊出了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所寫「社論」〈國語與臺語〉，他論及：「臺語的存在對於國語的推行，不僅無害而且很有益處，何容先生曾說：『方言在它本區域內推行，不但不妨害國語的推行，並且對於國語的推行有幫助（參看四月七日新生報「恢復臺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這是很對的。然而李武忠先生卻說：『推行國語時，方言能夠『消滅』……那當然『妙不可言』（參看四月十四日新生報「關於恢復臺灣話問題」）』，這令人莫名其妙『妙』。臺語的存在不僅於國語的推行有益處，於保存振興臺灣特有的演藝音樂等藝術文化，更有它的意義。」在此文中，陳文彬附和何容之見，並對李武忠所倡消滅方言的看法提出批判。

另外，在同報1946年5月11日刊出的〈利用臺語推行國語（下）〉，陳文彬再次談到：「我們的臺語的確被日語擾亂得多少有些變

<sup>47</sup> 參見何容：〈推行國語和恢復方言〉，《新生報》第251號，1946年7月2日。

質了，現在臺胞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能不參用日語而講純粹的臺語的，還不很多，……因為臺語在很長的歷史中被系統完全不同的日語所擾亂的歷史，只不過幾十年，且在現下的環境裡，恢復是不很費事的。……臺胞如不經過這一個過程，以日語的知識，來學習國語，這何異日人之學習我們的國語呢？……現在本省國語教員極端缺乏，我們以為暫時採用還不懂國語的本省教員，用臺灣音教國語文，即用所謂『孔子白』來教，亦無不可的。因為用臺灣音來學國語時，除了語音、聲調以外的語彙、語法等都能學到，將來，只要把語音、聲調改一改就成的。而語音、聲調，我在『國語與臺語』中，已經說過，國臺語間的這個關係非常密切，有法則可尋，將來要改是很容易的。即使不能完全改得很正確，也無礙於事。試問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中，有多少人能講標準的國語？本省的政府機關中，有幾個會說標準的國語？但卻不甚有礙於事。何況我們國語的標準還沒完全固定，多少還在移動之中呢！」於此可見，陳文彬正視了戰後初期特殊的語言學習環境，因此對於以日語知識學國語或是用臺灣音教國語，都保持接受與認可的態度，其人思維有與魏建功共鳴之處。

綜上，魏建功、何容等人主導的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其所主倡的由臺語復原以學國語的方式，雖然爭議聲或質疑聲在所難免，但表達肯定者亦所在多有，只是如何進行實地教學呢？從今日報刊之中琳瑯滿目的文章與報導，可見魏氏等人努力宣導的過程，而當時在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附設語文補習學校擔任教職的柯遜添，也自行編輯了《注音符號講義》一書，他結合了臺灣方言、國語與注音符號進行綜合式教學，以此引導讀者更為便捷的國語學習路徑。柯氏在書前編序上，表露了其人撰寫本書的用意：

現在本省對於推行國語，在省設有國語推行委員會，計畫指導，縣市設有國語推行所，公署教育處在臺北市龍口街設有語文補習學校，免費施教，可以說本省人學習國語的機會很

多。……我們本省的方言多是閩南語系，臺灣語原有八音甚至十五音，……國語不外只要「陰、陽、上、去、輕」說對了就行了。我已經說過本省人學習國語，是可以比外省人快的，現在我國正是積極推行標準國語的時期，在這推行標準國語運動中，就把標準國語當錦標，讓我們本省人和外省人競走吧！我們一定會得到優勝的。努力吧！<sup>48</sup>

此處柯遜添不僅不以爲懂臺灣方言者在學習國語會有所困難，反而特意挑出本省與外省人士的國語學習情況，以資鼓勵雙方競賽，而他更以爲懂得臺灣方言的本省人可以較外省人更快學會注音符號、標準國語。只是，耐人玩味的是，在該書之前，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齊鐵恨所寫之序卻別有深意：「先生閩南教師，嫻熟國語，主持校務，兼任課程；編著國音講義，比照當地方言，畫圖說明，指示精確……由此可見，方言之有助於國語的推行，其效至大！唯此冷門學術，好而樂之者究竟無多！時見課堂教室，鉤格喧囂，莫由暢達。」則如此顯見，齊鐵恨固然對於柯氏之舉有所稱誦，但其實並不真正看好由臺灣方言去學習國語之效，因爲懂得箇中三昧者太少，更何況去指導學生正確學習呢？

又，如果由方言學習國語無法形成巨大效果，則國語運動風潮又如何蔚然成形，方興未艾？因此，耐人玩味的現象就是，魏建功在1946年9月之後較少發表由方言學習國語之言論，他直到前往臺灣大學任教時，才又再賡續其理念，顯然是想改由高等教育著手推廣，<sup>49</sup>而《新生報》在1947年2月27日之後亦未再加鼓吹，相對地陳儀政權結束後，1947年9月起《中華日報》開始出現較多與國語

<sup>48</sup> 參見柯遜添編：《注音符號講義》（臺北：華明印書公司，1946年），頁3-4。

<sup>49</sup> 參見梅家玲有關魏建功編選之《大學國語文選》的討論，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爲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頁142。

運動有關的篇章，且多出自齊鐵恨之手，內容殆以倡導注音符號學習法的正音論為主。就此，一方面可以看到方言論與注音符號論，彼此雖然同屬國語推行委員會之主張，但其實內部有其緊張性與競逐性，也能由此發現臺灣國語運動推行歷程的階段與政策調整現象，魏建功路線顯然逐漸失勢中。<sup>50</sup> 對此，如果參考洪炎秋對於國語運動的回顧文獻，便更明白顯豁，他在〈國語日報十五年〉一文中，起首便謂：「統一國家，必須統一國語；統一國語，必須依靠那三十七個簡單而易學的注音符號來推行，纔能夠達到目的。」另又引述當時《民族晚報》社論的一段話：「至於注音符號，則已顯然收到了實際的效果。……我們覺得自五四運動以來所推行的各種文化運動，只有這一項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也百分之百的成功。」<sup>51</sup> 而事實是，以注音符號學國語，在1954年6月，便已全面落實到最基礎的國小教學中，當時教育廳函令各縣市政府與各省立小學，在初級小學一年級要先教「說話」和「注音符號」，洪炎秋認為這是國語文教學上的一個重大改革，而國民學校先教注音、說話，然後學文字的教學方式，在過去雖然遠自1920年就有「國民學校令實施細則」對於教授注音符號有所規定，但一直是具文，只有在臺灣，才全省徹底遵辦。<sup>52</sup> 所以，明白了上述現象，再回溯戰後初期的臺灣國語運動，自可明白魏建功最初以方言學國語的路徑，最終遭到了注音符號方法論真正的淘汰。<sup>53</sup>

<sup>50</sup> 不過，要補充的是，這並不代表由方言學國語的學習路徑至此便告消失，例如朱兆祥在《國語日報》發行的〈語文乙刊〉從1948年11月創刊起，至1950年代仍然持續進行從方言學國語之宣導與改革，更詳細的討論參見菅野敦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第3章〈台湾に消えたもう一つの「国語」運動——朱兆祥と「語文乙刊」〉，頁71-100。

<sup>51</sup> 以上參見洪炎秋：〈國語日報十五年〉，《癡人癡話》，頁43。

<sup>52</sup> 參見洪炎秋：〈十年來的臺灣國語運動〉，《癡人癡話》，頁102-103。

<sup>53</sup> 參見洪炎秋：〈十年來的臺灣國語運動〉，《癡人癡話》，頁103。

#### （四）國語、國文與言文一致

以上，藉由相關國語運動理論的剖析，除了勾勒當時臺灣國語運動實施重點之梗概外，也在指出「聲音」問題，尤其是方言與國語的音系溝通，以及注音符號作為國語學習之最佳方法論，二者均為國語運動之重要聚焦所在；但，實際上，國語運動其實不單留心「聲音」問題而已。

魏建功於〈「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一文中，首先對於「國語是什麼」展開發問，他說在一般人想像裡，國語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話，就此而言，在臺灣可將臺灣話當作國語，但由於「國語」此一辭彙其實歷經過三個階段的詮釋變遷，因此到了民國成立以後，第三階段的意義是：「中華民國的人民共同採用的一種標準的語言是國語，國語是國家法定的對內對外公用的語言系統」，這個新意義，可使許多語音系統不同的人，薈萃一處，融合相處，進而「選擇出最方便容易的聲音，鍛鍊成最簡單明瞭的組織」，故在如此的義界之下，國語還需觸及語言組織的問題。因此，完整的「國語」辭彙，其內涵便包括有以下部分：1. 代表意思的聲音叫「國音」，2. 記錄聲音的形體叫「國字」，3. 聲音形體排列組合表達出全部的思想叫「國文」；排列組合的規矩就是「文法」。為此，魏建功以為在臺灣的國語推行工作，除了「傳習國語」和「認識國字」兩件事外，最主要的還在「言文一致」的標準語的說和寫。<sup>54</sup> 綜上，則國語運動的推動，就不止於聲音與文字的標準化而已，還會涉及因應國語定義的現代化、國家化，進而致力追求的言文一致的文體表達化問題。也因此，魏建功才會從「臺灣話是也是國語」的論述理路，又向前一步提出「我們覺得臺灣的國語運動是要把『言文一致』的實效表現出來，而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理想也得到最後勝利」的結論。<sup>55</sup> 於是，從讀音、

<sup>54</sup> 以上參見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現代週刊》第1卷第9期，1946年2月28日，頁8-11。

<sup>55</sup> 參見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現代週刊》第1卷第9

國字、國文、文法、言文一致到新文化，臺灣國語運動論述的思維結構，實際也就統合著聲音、文體與國體三部分了。

那麼，以上除了聲音問題前面已多所討論外，關於其他亦為時人所重視，如言文一致問題，霜香〈旅臺雜感〉一文敘述了自身來臺所見所感：

外省人讀到臺灣出版的新聞雜誌、必須經過長久的思考、才能夠約略明白。有幾篇用古文寫的、竟至像天書一般、即使再三研究、也弄不清楚。我們不能不想到文化侵略的可怕！……臺灣的國語運動、十分發達、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國文實在比國語更重要、倘使口裡雖然能夠說流利的國語、而筆下所寫的還是日本式或中日混合式的國文、那麼、臺灣的文化、仍不免受日本的支配、這是不能不希望臺灣同胞加以最大的努力的。<sup>56</sup>

霜香批評臺灣出版雜誌上的古文作品，令人不忍卒睹，於是體會到國文比國語更為重要，臺人筆下文體或為日本式風格，或屬中日混合體，清楚舉出臺灣說、寫不能一致的困境。而相近的感受，正是魏賢坤編寫《初級簡易國語作文法》的動機，他在自序中有言：「臺灣自光復以來，於茲已四閱月矣，各地方多以國語、國文不通為憾事，現各處國語之研究，已簇出如雨後春筍，然其間雖有間教國文者，究竟言文不一致，學者對於作文之法，反覺茫然。鄙人有鑒及此，不揣菲才，特將作文法編成一小冊，名曰初級簡易國語作文法。（案：原文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sup>57</sup>而魏建功也坦承「言文一致」的追求，在施行上遇到了棘手問題，這是因為：「除了一些編輯先生在編輯室裡創作的『國語』以外，就只有教學生模仿學古人的舌的選文範本；

期，頁12。

<sup>56</sup> 參見霜香：〈旅臺雜感〉，《現代週刊》第1卷第7、8期（1946年2月16日），頁6。

<sup>57</sup> 參見魏賢坤序，文見魏賢坤編：《初級簡易國語作文法》（臺中，泉安行，1945年），不記頁次。



選文本是應有的，但我們的青年從沒有得到一部真正可以教他們寫出巧妙文章的選本。」<sup>58</sup>

以上三人所述，均著眼於「言文一致」之問題性，而除了留意到國語與國文的斷裂性，臺灣文章文體的混雜化，也還言及此時臺灣有關文章之書寫乃是文言與白話兼有，但誠如魏建功所述，若要真正以「國語」來創作，則學生不宜以「模仿學古人的舌的選文範本」為例，故實際已經暗示了所謂「國語」中的「國文」，當屬白話之作，則如此一來臺灣文學中的文言與白話典律之爭，也將隨著國語運動而產生波瀾。而文、白之外，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臺灣志識階級〉一文更慮及了應該用怎樣的語文來書寫，其人意見如下：

在這版圖光復、鄉土建設的大目標下、我們智識人應是媒婆、應是座橋樑、……在這短時間中我們應積極地創設各種城市或鄉村的國語普及會或夜學。……要肩起了啓蒙民眾運動的大工作、因此要進一步研究技術的問題——那是要用甚麼話寫呢？……就現在我們祖國的文字情形來說、大略可分為四種、一種是古文的文言、一種的梁啟超式的文言、一種是舊小說式的白話、一種是五四式所謂語文合一的白話、最後的一種便是現在我們祖國通行最廣大的文字。在這五十年日本奴隸教育之下、除了民間殘留一些極少數的古文的文言和舊小說式的白話以外、可以說對於祖國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沒有受著絲毫直接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一張白紙，……在這緊急關頭，我們要用的話應當是我們祖國最通行、最普遍、最標準的話，我們要寫的文字，自然而然愈欲接近這種話的文字——那就是五四運動以來流傳下來的白話文啦！……跟著我們要用甚麼話寫的問題以後、就是要研究我們要寫什麼？這問題可分兩方面來說。

<sup>58</sup> 參見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現代週刊》第1卷第9期，頁12。

第一是形式方面。爲了要普及、爲了給廣大民眾更容易的瞭解、我們最初應用著極淺近的敘述方法的文字。……第二是內容方面。……現在是「夜」與「晝」交替的時代、是需要我們智識人不辭勞苦爲我們的新國家、新鄉土重新建設的年代。這是偉大的轉形期、這是「千載一遇」的好機會。我們正不應該放棄了我們最重關頭的责任。<sup>59</sup>

在林氏這篇語氣高亢、充滿熱情的篇章裡，他除了提到要廣設國語普及會來啓蒙民眾之外，更想藉由健筆進行思想改造，於是提到了「用甚麼話寫」的問題，他選擇了「五四式語文合一的白話文」作爲書寫載體，而此處所謂「語文合一」的祖國通行、普遍、標準文字，便是魏建功等人所倡導的「言文一致」的國語文。只是，「言文一致」的國語文的最佳典律，是否就是如林萍心所看重的五四式的白話文，相關的選擇與辯論，將會隨著國語運動帶給臺灣文學的更多刺激與影響，而受到愈大的矚目。

### 三、當臺灣文學遇上國語運動

戰後初期在臺灣上演的國語運動，儘管魏建功等人嘗試引領臺人透過方言去學習國語，並強調臺灣話也是國語，而所謂「標準化」乃係自然形成，但一旦國語由「在國中使用的語言」，一躍成爲「人民共同使用的標準語、國家法定語言」時，「國語」就注定要和國家現實政治張力相鉤連，「國語」在本質上就會被國家政治霸權與國家認同的巨大影子籠罩，導致在戰後初期出現了「不說國語，就不是中國人」的宏大敘述。然而這樣的思維結構，並非僅僅出自來臺官方，曾經擔任參與國語運動推行要角的洪炎秋亦抱持同樣信念，他如是說：

---

<sup>59</sup> 參見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臺灣智識階級〉，《前鋒》第1期（1945年10月），頁9-11。



「什麼樣的人纔可以叫地道的中國人呢？我以為一個地道的中國人，起碼要能夠用中國人的看法來觀察事務，能夠用中國人的想法來運用思想，換句話說，就是能夠本著中國精神去應付一切。光復如果沒有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就不能夠算徹底完成。所以要使光復徹底完成，就非努力去光復中國精神不可；要光復中國精神，就非努力去使大家能夠熟達中國的語言文字不可。……所以恢復中國的語言文字，就是恢復中國精神的先決條件。」<sup>60</sup> 唯有使用國語，才能與中國人的看法、想法與精神相聯繫、相等同，才算徹底的「光復」。

而麗明在〈臺灣光復後的新使命〉一文也有同樣表述：「五十年來，日本統治臺灣，強制人民思想，和施行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是他統治的重要手段。取締民族思想，消滅固有文化使其忘記原來的祖先，所以現在的臺灣青年甚至有不識國文，而且忘記了是中華遺裔，雖然有不少的民族志士，隨時在提醒臺灣同胞，但魔高一丈道高一尺，而且日人制壓民族思想的抬頭，非常嚴厲。現在已獲解放，是獨立國家的公民，我中央政府已在計畫重建教育，但我先進的臺籍知識人士，應該群起協助政府，掃除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和奴化思想，灌輸民主、自由的革命的時代思潮，和三民主義的理論，普及教育，尤其注重我國語文的普及，徹底掃除五十年的毒化教育。」<sup>61</sup> 也就是說，在麗明眼中，戰後初期臺灣學習國語，不單只是認識國家法定語言，更同時牽涉去除日治五十年的「毒化教育」，以及回歸中國的文化重建工作，語言、認同、文化、國家連成一氣，戰後初期臺灣便在如此的空間政治與語言思維結構中「光復」了，而中國國體至此得以獲得確立與重光。

<sup>60</sup> 參見洪炎秋：〈光復節和國語日報〉，《癡人癡話》，頁111。

<sup>61</sup> 原載《臺灣月刊》創刊號（1945年11月），此處轉引自曾健民編著：《1945：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文集》（臺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頁162-163。

### (一) 從「國語」問題看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 中國文學的嫁接

置身在前述新語言秩序轉換的環境中，學習國語既是一種愛國的欲望，但也難以遁脫從日文轉換成國語時的壓迫性與支配性，兩難的糾葛情緒於是在臺人身上流盪。在「國語」的新興國度裡，臺灣人既想找到後殖民的新世界，但也立刻發現這裡同樣是鬥爭之所，多元化的國語學習經驗與複雜心理反應於焉產生。楊逵在〈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提到：「回顧臺灣新文學的過去，我們可以發現到的特殊性倒是語言上的問題，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與民主科學』這一點，與國內卻無二致。光復以來快三年了，應要重振的臺灣文學界卻還消沈的可憐，這原因其一是在語言上，就是，十多年來不允使用被禁絕的中文，今日與我們生疏起來了，以中文就很難充分表達我們的意思了。」<sup>62</sup> 楊逵一方面肯定日治時代臺灣新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反帝反封建與民主科學」特質並無隔閡，甚且是同步發展，但也承認要以中文表達意見十分困難，於此清楚道出國語運動為臺灣文學作家們所帶來的困境。近似的意見，吳瀛濤一樣身有同感，他也為中文寫作感到困難：

臺灣文藝運動過去是以白話文開始，臺灣白話文沒長久歷史，這原因是由於日政府政策上要改造日文，所以後來的青年和國文很生疏，而都轉向日文，一般人在日人教育下普遍都受過小學教育，所以一般對日文文法都有一些基礎，但是對國文卻沒有認識。光復後我們回到祖國的懷抱，一部份文化人士都起來做文藝工作，……直到二二八事變後就沒有什麼工作表現。對於工作的沈寂固然有種種原因，主要還算□中文寫作困難□

<sup>62</sup> 楊逵：〈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58。

（案，原字亂碼有誤）發表的園地太少。<sup>63</sup>

戰後的國語學習，讓吳瀛濤重新回溯日治時代的白話文學習經驗，他指出了臺灣在戰前已經有過白話文的事實，而且當時的文藝運動就是由白話文開始。只是可惜的是，因為日語教育緣故，造成了一般人對日文文法熟悉，但於國文卻沒有認識，以及直到二二八事件後，中文寫作仍感困難。

倘若綜合楊達與吳瀛濤的二段話，其中可以發現當臺灣文學遇上國語運動之後的許多耐人玩味的現象，包括：其一，經歷過戰前、戰後的作家們，開始了連結戰前與戰後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可能聯繫，如白話文之學習，以及日治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在文學特質上的一致性，這之間便涉及了戰後有關戰前臺灣文學歷史記憶的重建與評價；其二，因為國語運動關係，臺灣語文問題獲得重新思考，吳氏話語中共計出現了白話文、日文、國文、中文等語文辭彙，則這些辭彙之間的相生相剋關係，顯然值得釐析；其三，楊達與吳瀛濤二人文字乃發表於1948年，即文中二二八事件之後，但二人均感中文寫作困難，由是可知國語的學習，從聲音到言文一致，到成形為文學，雖然已經歷經數年，仍然難以成事，足證國語運動為日治臺灣日文作家帶來之莫大衝擊。

也正因為對於文學創作者而言，國語的學習不單只是聽與說而已，更會攸關創作語言的變化。因此甫於1946年6月成立的「臺灣文化協進會」，在其協進會章程中，明訂成會宗旨之一就是「推行國語國文」，<sup>64</sup>且在成會後的第二個月，就隨即於中山堂召開「初次文學委員會懇談座談會」，當日出席者包括郭水潭、張星建、楊達、呂赫

<sup>63</sup> 參見瀛濤：〈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一）中文寫作困難（二）發表園地太少〉，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61。

<sup>64</sup> 參見臺灣文化協進會：〈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頁28。

若、張冬芳、王昶雄、王詩琅、朱石峰、蘇維熊、施學習、黃得時、洪炎秋、許文葵、陳有諒、林荊南、吳漫沙等，座談內容討論到了「表現形式與言語問題」。<sup>65</sup> 從出席者之踴躍，且主要囊括了日治後期重要作家來看，國語言語問題的困擾顯然不小，而因應之道也需集思廣益。事實是，語言問題果然成爲臺灣文學無法迴避的重荷，且在多位外省作家眼中，臺灣文學語言的非國語化，更隱然變成一種特殊性的存在，這除了本文前面已經引用過的陳大禹的洞見之外，歌雷在〈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關於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及其應有的三種努力〉中也有表示：

臺灣文學今日所有的特殊性大略有幾種：第一、就是真正臺灣作者所用的文字除日文外，所用的中文的語文，仍是停留在五四時代，或許更早於五四時代的語文法。……多半保留一種彷彿國內五四時代的白話文所有的那一種直敘的表現方法。因此今日在語文的形式技巧上與國內作家遂產生了距離。第二、因爲日本統治了臺灣五十一年，這五十一年中，文學上滲進了日本語文與臺灣所有的一種鄉土中所變化的俗語與口語的語文，這些不但在語彙詞彙上產生了極大的混雜的現象，並且在語法文法上，也與今日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差異。<sup>66</sup>

相對於楊逵、吳瀛濤等臺人作家在面對國語運動所憶及的日治時代臺灣白話文書寫，歌雷明顯指出當時的白話文，所謂的中文語法，還停留在五四時代，這樣的文體與目前中國國內作家顯有距離；其次，臺灣文學不是使用純粹的「國文」，已經加入日本語文及臺灣鄉土口語，致使臺灣文學語文，即使運用白話文創作，也無法直接相等於中

<sup>65</sup> 活動訊息參見《臺灣文化》第1卷第1期，頁30。

<sup>66</sup> 參見歌雷：〈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關於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及其應有的三種努力〉，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62。

國語文的文體。所以，歌雷在該篇文章末了，更強調臺灣文學在今日的現狀中所保有的特殊性，其在未來的新文學發展上，一定要經過「揚棄」的過程。換言之，日治時代的白話文無法在戰後沿用，它不同於戰後的國語文，所以戰後初期的國語運動，在促使臺人召喚日治白話文運動記憶時，卻又同時面臨了需加揚棄的際遇。

另外，歌雷對於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顯然也不認為臺灣作家要將之視為文體書寫的典範，此與前曾引述的林萍心意見不同，而與雷石榆在〈臺灣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的想法亦異。雷氏以為：

當時出版的《臺灣文藝》我常常看到，……所刊載的作品，不出於自然觀念的寫作方法，用國文寫的部分，文字的使用也停在「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階段加上一些地方語言。……在臺灣文學創作問題，基於以上的理解，我們不妨提出幾個根本的原則：……二、接受及攝取中國的文學遺產，尤其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成就（臺灣智識界普遍地知道魯迅等作家，但從日文翻譯的去認識，遠不如從原文去體會），這一方面對隔閡的祖國文化有接觸的機會，同時對於文字的使用，寫作方法也有補助。三、爲了適切地表現人物的性格、習慣，在對話上不妨使用地方語。……臺灣的語彙也許很不夠用，但不妨象聲創造。<sup>67</sup>

雷石榆從其自身曾經接觸過日治時期臺灣文藝雜誌刊物，與近身掌握臺灣文學現況的經驗出發，認可了五四時代的白話文、五四文學作家作品對於戰後初期臺灣文學仍然具有書寫範式的作用，他也提到魯迅作為臺人作家模仿學習對象的意義，以及接受臺灣使用方言做爲文學語彙的可行性。就此，可以瞭解就如同魏建功以臺灣話學國語的路徑，臺灣文學是否使用方言問題，因爲國語運動的觸媒作用，成了若干作家苦惱的焦點，而這是否可以藉之成爲臺灣文學的特殊性面貌，

<sup>67</sup> 參見雷石榆：〈臺灣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110-111。

乃至使臺灣文學此一名稱有了獨立位置的話題討論，則可從《新生報》「橋」副刊論戰的紛紜四起去一窺究竟。爲此，揚風和雷石榆甚至因爲外省人能否真正理解臺灣方言與鄉土文化，而引發是否有資格評述、引導臺灣文學正確出路的激辯。<sup>68</sup> 當然，更進一步的討論，甚至會波及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緊張關係，瀨南人在〈評錢歌川、陳大禹對臺灣新文學運動意見〉中就砲轟時任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基於「語文統一，思想情感又復相通之國內」去談建立臺灣文學是「樹立分離目標」的謬誤，他強烈認爲「鼓勵於創作中刻劃地方色彩及運用適當方言」是方法上的問題，而非以此就證成「得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對立」。<sup>69</sup> 以上的論戰，不能不說是因爲中國國語與臺灣方言之間的相生相剋性關係而來，而且極爲明顯地，從創作語文的選擇與學習，到方言辭彙或方法論的使用，乃至臺灣文學作爲地方文學是否挑戰了國家文學的一體性，莫不伴隨著運動之實施，而帶來了文體與國體上的思辨與論議。

## （二）白話文學與古典文學的競逐

在上一單元中，我論及了國語運動爲臺灣文學帶來的諸多紛擾，以及作家們的艱難苦境，但不能不留心的是，即使有過省內外作家的猛烈砲火或針鋒相對，在國語運動的時代潮流中，臺灣文學也因此展開了與祖國文學的衝突、對話與嫁接，並且有了回顧與重構日治時代文學記憶的契機與空間，這對於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成長而言，實際仍有其意義與價值，如此才算平實理解1945年至1949年間的臺灣文學存在面貌。

不過，如果仔細分疏，臺灣作家群在面對國語運動時，其實所呈

<sup>68</sup> 參見揚風：〈新寫實主義的真義〉，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151-152。

<sup>69</sup> 參見瀨南人：〈評錢歌川、陳大禹對臺灣新文學運動意見〉，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139。



現的並非均質性的反應。張我軍在〈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中言及與張文環會面的情景：

我一邊和文環君且走且談，一邊斷斷續續地想著文環君的事。在臺灣光復以前，他是臺灣的中堅作家，做一個文學作家正要步入成熟的境地。就在這當兒，臺灣光復了。臺灣的光復在民族情感熾熱的他自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一件快心事，然而他的作家生涯卻從此擱淺了！一向用日文寫慣了作品的他，驀然如斷臂將軍，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將創作之筆束之高閣。光復以來雖認真學習國文，但是一支創作之筆的練成談何容易？況且年紀也已不輕了，還有數口之家賴他謀生哩。目前他的國文創作之筆已練到什麼程度我不清楚，但是他這幾年來所受生活的重壓和為停止寫作的內心苦悶我則知之甚詳。我每一想到這裡，便不禁對文環君以至所有和他情形類似的臺灣作家寄以十二分的同情！論到這一點，臺灣的美術家和音樂家是萬分幸福的。文學所用以表現的工具是文字，這有國文、日文、英文等之別，但他們所用以表現的工具是色與音，……無須停頓，更無須另學一副工具。<sup>70</sup>

這段具象生動而又充滿悲憫的描述文字，詳細刻劃了張文環及與其同命運的日文作家，在光復之後卻驟然失去創作能力的痛苦處境；此外，則是釐辨了美術與音樂作家在戰後與文學作家的不同際遇。

其實張我軍的文章也提醒了我們，能夠使用國文與否，是適應戰後生活與持續創作的關鍵。以張我軍而言，張氏在戰前的臺灣新舊文學論戰中，是主張以北京白話文創作的大將，他在戰後重新回到臺灣，而且因緣際會承繼了日治時期曾經在臺灣出版過的《中國國語文做法》，又於1947年新編《國文自修講座》。此書是為使讀者能完全

<sup>70</sup> 參見張我軍：〈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臺海出版社，2000年），頁366。

自修為原則，目標放在「一個國民所應有的最低限度的國文能力」，約略是起自國民學校四年級國文程度，終止於初級中學畢業程度，而考量到臺人多數仍無法閱讀國文，因此先借用了日文撰寫前六卷內容，到第7卷至12卷則完全以國文講解。<sup>71</sup>於此可知，張我軍在戰後因為國語教科書的撰寫，得有機會成了國語運動的協助者與傳播者。

與張我軍一樣可以正面迎向國語運動者，尚有其他具有中文讀寫能力的若干文人、作家，例如蔣培中在〈「時潮」所負的使命〉所言：

島民同慶光復……現在我們言論自由時代到了、創刊新聞雜誌、如雨後春筍一樣。這當中、我們的「時潮」半月刊又產生了出來。這是我和漫沙老同志、不自量力、不辭艱辛、而產生的「時潮」。……現在臺灣文學莫說幼稚、因為灌輸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精神、這個惡劣思想、根本要掃蕩打破這異族精神、必須改頭換面、嶄然一新、培養我們的民族精神的文學、目下依我政府方針、第一步著手革新教育。教育基礎、推進識字運動、以及國語普及運動、這是先決問題。「時潮」所負的使命、為順時勢之潮流、建設臺灣文藝復興文化跟著祖國最高水準文學、一直邁進。<sup>72</sup>

蔣氏自況與吳漫沙順應國語普及運動，而創設了「時潮」雜誌，希望藉此順時勢潮流，使臺灣文學跟隨祖國最高水準文學前進。

不過怎樣才算是識得國語者？由劉文碩編輯、鍾雲龍發行的《大同》雜誌，陳述刊物編輯動機與旨趣的〈創刊詞〉表述，提供了頗堪玩味之處。該創刊詞敘述如下：

今我臺灣。重返祖國。慶祝光復。我六百餘萬同胞。需負建設

<sup>71</sup> 參見張我軍：《國文自修講座》，卷1，序及導言，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頁430-434。

<sup>72</sup> 參見蔣培中：〈「時潮」所負的使命〉，《時潮》創刊號（1945年12月），頁18-19。



新臺灣之重任矣。然處五十年桎梏之中。凡語言文字。皆被其泯滅無疑。雖漢民族而不知祖國語言文字。詩書不能讀。報紙不能閱。我國之文化。何從而得知。學問何從而求乎。敝同仁有鑑於斯。……發刊本誌。以鼓吹臺灣新文化為使命。<sup>73</sup>

此處文章乃以淺近文言文，且採舊式句讀為之，從中可知具備文言文讀、寫能力的《大同》雜誌編輯同仁，自認能夠瞭解祖國語言文字，且有建設臺灣新文化的職責，然而「知祖國文字」是否等於「識國語」？而前面曾經討論過的，以臺灣方言作為戰後臺灣文學創作語言都曾惹來非議，則類似像《大同》創刊詞使用的文言文體，背後所潛藏的語言思維結構，是否能夠滿足標準國語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在戰後的《大同》編輯者流，相較日文作家或許有其可以發揮處，然其語文正統性又是如何？吳新榮以下文章，對此有了更多的說明：

自光復以來，我們原有的文化小集團，卻在無形中解散了。……在這鄉裡附近還有一位文化人，他是這地方著名的漢學家，他就是我們所尊敬的芹香先生。……可是他現在已不能再站在我們的面前，怎能不使我們不感到痛惜呢。這也許就是暗示著舊文化的退場吧。……為了祖國獲得光榮的勝利，在臺灣我們的臺灣話終於驅逐了日本話，……然而現在呢？國語當然用國語教授，國文也可以用國語教授……結果半用日本語半用臺灣話，甚至半用國語，在一種混亂的情形下教授著。像這種語言的混亂狀態，是不是表現著文化的混亂嗎？關於臺灣話，我自有一種意見，像我從小就沒有讀過漢文，因此我所讀的漢音常有不正確的地方，而我寫的漢文也常不清不楚，但是我一旦用了臺灣白話式的話法，寫一篇土話文章給一般人看，人們都說比漢文更容易使人瞭解，比白話文（國語文）更文明

<sup>73</sup> 參見〈發刊詞〉，《大同》創刊號（1945年11月），頁1。

白。像白話文裡面，有如「很」或是「夠」等字，由臺灣白話文看來，是一種話渣，所以我主張除掉學校教育外，在一般文盲農村大眾，應有研究臺灣白話文之必要。有人說臺灣話是一種死語。我卻以為未必然，用正確的文字，表現正確的白話。這必定可為理解國語的導火線，但用臺灣話，而研究使其成為有系統的方言，這也可以助國語更進一步的發達。<sup>74</sup>

換言之，能夠知曉祖國語文者，若僅是漢文者輩，其實在面臨正宗國語的來勢洶洶之後，很快就會敗下陣來，吳新榮所熟識而敬佩的芹香先生便是如此。是故，「漢文」不等於國語、國文，「漢文」在文字上雖與國語、國文有著「同文」性，但在聲音、文體與時代、國家的代表性上，則是失了勢的不及格者，吳新榮在此更加凸顯了「白話文」（國語）的現代性與正典性意義。另外，在本文中尚有一特別處，則是其所謂臺灣話文體比起國語白話文更讓鄉間人理解，故主張在學校國語教育之外，於農村文盲大眾鼓吹研究臺灣白話文，並進而協助成為有系統的方言，以俾利國語進一步之發達；於此除了呈顯其人的語文階級觀外，也可發現與魏建功理論共振共鳴之處。

至此，上述吳新榮的事例在指出「漢文」於戰後的不合時宜之餘，另一個意義則是間接道出了「古典文學」將難以與國語白話文文學競逐的事實，這正如杜重〈推進臺灣文藝運動的我見〉一文所述：

現在臺灣光復了，對於推進臺灣文化運動自有當局在主持，我們不想在這裡討論，而作為宣傳最有力量的工具——文藝，……應該承認文藝對於當前臺灣文化運動的推進是具有極大的作用的。尤其在現階段臺灣文化運動是以推行語文運動為重點的時候，那末更應該重視文藝這一部門。我們以為文言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雖然還有人在主張復古，推行文言

<sup>74</sup> 參見吳新榮：〈文化在農村〉，《台灣文化》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頁21。

文，但這究竟是過了時代的，……爲了要求語文一致要求我們的思想嚴密，……我認爲白話文無疑的要比文言文合理而健全得多，因爲從社會的意義上來講，是代表一種進步的人民的意識，……。「五四」是中國新文藝運動，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一連串中國現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全部是用白話文來寫的，……在推行國語運動白熱化的現階段，我以爲若把這些巨將們的文藝作品給臺灣同胞們作閱讀的東西，那是非常有意義，並且一定能收到實際的功効的。……總結起來說，要推進文化建設運動，要推廣國語運動，那麼，新文藝的重要性便不應該忽視。……最後，我要特別提出的是，舊詩在臺灣有保留的必要。正如曾今可先生說的：「詩人在臺灣，不是一個偶像，而是一種力量。」這句話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全臺灣的每一個城市和鄉鎮，都有詩社，詩人遍布士、農、工、商各階層。這是事實。這事實證明了曾今可先生的話是一種真理。<sup>75</sup>

他首先指出臺灣光復後，文藝很少受人注意；其次，以爲文言文的時代已經過去，雖然有人主張復古，推行文言文，但這究竟過了時的；其三，以爲應介紹巨匠作品，如魯迅、郭沫若、茅盾，且謂介紹更重於創作；其四，建議加強副刊文藝活動；其五，倡言舊詩在臺灣仍有保留必要，並引述曾今可之言爲據。

以上杜重的言論，凸顯了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因爲國語運動的緣故，所導致的臺灣文白／新舊文學版圖的可能滑動，以及古典文學中詩、文生存狀態的巧妙變化，<sup>76</sup>乃至於在基本的語文問題之外，又漸

<sup>75</sup> 參見杜重：〈推進臺灣文藝運動的我見〉，《建國月刊》第2卷第6期（1948年9月），頁14-15。

<sup>76</sup> 相關問題，黃美娥〈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民國風雅——現代中國的古典詩學與文人傳統」會議論文（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2012年12月14-16日），頁1-180〕已初步討論。

漸出現了攸關文學創作實踐的種種問題，這包括了真正的白話文文學是什麼的本質性思考。那麼，究竟值得臺人學習、效法的中國白話文文學，可供仿效的創作範式源頭，該是五四白話文學？或係剛結束充滿戰鬥力與民間性的抗戰文學？或是具左翼色彩的人民文學、大眾文學？作家典範是前曾述及的魯迅諸人，或是其他？在國語運動進入臺灣文學內部之後，其所相連結的一連串攸關文學秩序、文學場域變化的事項，便也次第展開，各式討論百花齊放、眾聲喧嘩。

#### 四、結語

有關戰後初期這段暗潮洶湧、波瀾迭起的臺灣文學史，歷來頗為學界所注意，迄今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嘗試結合國語運動之影響論做為研究視角，將之視為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展開嫁接的基點，然後再據此進行臺灣文人作家角色扮演與肆應態度的考察，以及相關臺灣文學自身發展環境變化問題的種種探問。而為了釐清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學所產生的語言政治作用力，以及國家體制下的文學秩序變化，於是全文先透過多種文獻勾勒了戰後初期臺灣國語運動的全民化盛況，次而再就魏建功等人主要言論予以剖析，另外則由聲音、文體與國體三面向探索臺灣文學遇上國語運動後的複雜制約現象。

而通篇研究所得，除釐析了魏建功以臺灣方言推動國語運動的文化思維結構，與指出其後由此所引發的方言書寫與臺灣／中國文學的多元互動關係外，並且陳述了戰後初期臺灣不同語文群體作家置身國語運動的心境與處境，以及在面對「國語」、「國文」這些具現代性、國家性意涵的辭彙後，臺人有關中文、漢文、白話文、古典文學指涉意涵的思辨意義。至於，隨著「國語」的誕生，所導致的更多元影響，包括文學知識系統轉換、文學典律更動調整、文學作家範式選擇確立等問題，於此尚不及深入探索，將於他文另加交代。但，即使如此，本文上述的諸多說明，已然顯示了戰後初期國語運動對於臺灣文

學，實際已經留下了豐富糾葛的時代印記了。

（責任編輯：莊勝涵）

## 徵引書目

- 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臺北：國語日報社，1965年。
- 王潔宇：〈學國語〉，《新生報》第490號，1947年2月26日。
- 何容：〈「從臺灣話學習國語」序言〉，《新生報》第244號，1946年6月25日。
- 何容：〈推行國語和恢復方言〉，《新生報》第251號，1946年7月2日。
- 吳仁華：《臺灣光復初期教育轉型研究（1945-1949）》，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 吳守禮：〈臺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新生報》第209號，1946年5月21日。
- 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臺灣智識階級〉，《前鋒》第1期，1945年10月。
- 柯遜添編：《注音符號講義》，臺北：華明印書公司，1946年。
- 洪炎秋：《癡人癡話》，臺中：中央書局，1964年。
- 殷塵：〈錢玄同先生的學術思想〉，《圖書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0月。
- 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臺海出版社，2000年。
- 張芳杰：〈論從臺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第244號，1946年6月25日。
- 張博宇編：《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 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7期，2010年2月。
-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第29卷第4期，1991年12月。

- 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年。
-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
- 曾今可：〈文藝作品的社會價值——八月二十五日在臺灣文藝社學術講習會講〉，文載《建國月刊》第2卷第6期，1948年9月1日。
- 曾健民編著：《1945：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文集》，臺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
-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 楊彥杰主編：《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
- 楊富閔：〈戰後初期（1945-1949）花蓮地區語文學活動之「中國化」現象：以《東臺日報》為觀察場域〉，花蓮：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會議論文，2011年9月24-25日。
- 臺灣文化協進會：〈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印：《陳長官治臺一年來言論集》，臺北：臺灣新生報印刷廠，1946年。
- 蔣培中：〈「時潮」所負的使命〉，《時潮》創刊號，1945年12月。
- 憲兵第四團諍友報社：《臺胞國語補習課本》，臺北：民報社，1946年。
- 霜香：〈旅臺雜感〉，《現代週刊》第1卷第7、8期，1946年2月16日。
- 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現代週刊》第1卷第9期，1946年2月28日。
- 魏建功：〈國語的德行〉，《新生報》第194號，1946年5月6日。
- 魏建功：〈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第276號，



1946年5月28日。

魏建功：〈國語的四大涵義〉，《新生報》第223號，1946年6月4日。

魏建功：〈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新生報》第244號，1946年6月25日。

魏賢坤編：《初級簡易國語作文法》，臺中，泉安行，1945年。

菅野敦志：《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12年。